



复旦大学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复旦大学老教授协会 编
复旦大学党委宣传部

复旦名师剪影

(文理卷)

复旦大学出版社

编 委 会

主 任: 王小林

主 编: 钱冬生 张永信 方林虎 萧思健

执行主编: 王增藩 刁承湘

编 委: (按姓氏笔画排序)

丁言雯 刁承湘 王小林 王增藩 方林虎

邵 瑜 张永信 陆士清 陆昌祥 金文英

金邦秋 杨慧群 钱冬生 钱益民 徐志伟

黄全娣 萧思健 萧辅珍 鄂基瑞 韩宗英

以“人”为本，叙说复旦

——序《复旦名师剪影》



《复旦名师剪影》编辑出版了，真是可喜可贺！

复旦大学创始人马相伯先生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诸君皆系学生，所谓大学者，非校舍之大之谓，非学生年龄之大之谓，亦非教员薪水之大之谓，系道德高尚、学问渊深之谓也。”清华大学老校长梅贻琦先生也曾说过“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先贤们的叙述道出了大学的本质属性，即，道德、学问、大师和学生；同时，也使我们思考究竟应该如何来言说大学。

遗憾的是，近年来，有这样一种让人既恨又难以摆脱的倾向，即，各个学校均在各种场合列出了对本校有利的各类数据来叙说自己的学校。我也十分清楚，这样的定量叙述对有关部门还是很有效的，通常可以为自己学校换取诸多的实际利益。但是，我们常常忘记大学里的“人”，即，教师和学生。或许，这是当今对大学的叙说存在的一大问题。这种见“物”或是见“数”而不见“人”的大学叙说方式是极具危害性的：它使得大学不如以前那样得到推崇，因为就“物”而言，大学确实没有太多值得羡慕的；它使得学校精神衰落，学术与利益结盟，使得其中的“人”也滋长物欲，一旦物欲未能得到满足，就大呼小叫地抱怨；它也使得学生的求学目的变得更加功利，而“物”化了的大学本身也对学生施加了功利性的暗示；它更使得作为大学里的“人”的教师和学生的尊严受到严重的伤害，使得大家对大学教授、学生乃至校长的批评变得粗鲁、野蛮，有时甚至毫无理性可言；……恰如北京大学陈平原教授所言，“现在对大学的论述并不理想，导致我们拼命在上面涂鸦，导致我们没有精神家园。所以我想，要用什么方法让大家觉得现在的大学仍然值得期待。”

当然，大学的叙述方法可以是多样化的，但我认为，对大学里的“人”展开充分的叙说应该是其中十分重要的方法之一。就复旦大学而言，是复旦

人创造了复旦的历史,也创造了复旦的精神和传统;尊重历史、尊重传统,并使之发扬光大,使复旦的未来更加辉煌,是我们后辈义不容辞的职责。为此,我提议编写《复旦名师剪影》,向复旦的教师尤其是学生讲述复旦名师的故事,并以此培养我们新一代的复旦学人。这里用“故事”二字有我的考虑:一是因为“故事”要比“校史展览”更加细致、具体,更加鲜活,也更贴近我们的日常的生活、学习和学术活动;二是因为我相信“大学需要故事,有故事的大学才有魅力!”

我深感欣慰,我的提议得到了学校的“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老教授协会”和“党委宣传部”等单位的积极响应,他们组成了编委会,汇聚了一批老同志开展辛苦的编写工作。读着这些书稿,这些老师的金色的名字一个个在我眼前闪过,所写的复旦名师的生动事迹深深地感动了我。我由衷地向他们表示深深的敬意!复旦所以有今天的辉煌,根本的原因之一就是名师良师辈出,数以千百计。他们有的是杰出的教育家,有的是杰出的医学教学家,有的是科学家、学问渊博造诣精深的学者和文林的俊杰。他们忠诚于教育事业,在教学科研和医学教育的岗位上,燃烧自己,鞠育英才;他们在各自的科学和学术领域中开拓进取,引领风骚!他们的名字像一颗颗亮丽的星星闪耀在复旦的天幕上,镶嵌在共和国的科学、医学和学术史册中。这些闪光的名字是马相伯、颜福庆……他们一个个名字就是一座座学术的丰碑!我们要感谢复旦和上医的先贤,他们筚路蓝缕,艰苦创业,使复旦有了今天!我们这些名师良师,不仅创造了卓越业绩,还给我们留下了足以传世的风范。

编委会将书名取为《复旦名师剪影》,我觉得非常恰当。既然称谓《剪影》,表明我们并不企图去勾画一个人的全貌,而只是对真实的人和事从某个视角进行投影;因为是《剪影》,其“投影”的视角完全由作者来选定,所以其不能被看作是一个人的传记;由于选取的投影的视角不同,故事的叙述也多彩纷呈,同一个人在不同视角下也显现出不同的风采。

或许有人会担心作者的叙述可能会因其主观看法而产生一定的“扭曲”或“夸大”。我想告诉大家的是,独特的视角确实会产生对人和事的独特的叙述,但这也反映了作者对复旦学者应有形象的一种期待和“塑造”。同时,每一位作者均有自己独特的文风和叙事风格,对此也没有必要强求统一。或许,这样的方式叙述的故事才更易被大家所乐于传诵,并形成对复旦人的独特的记忆。

既然称谓《剪影》,我们也并非企图去对一个人作一个“鉴定”。金无足

赤，人无完人，“完人”不是确定编写对象的要素。人处在复杂的社会关系中，对人的评价也会因人而异，所以“舆论一律”也不是选择的依据；编委会看重的是编写对象所创造的业绩和浸渍在业绩中的精神。本着这个原则，编委们既不回避编写对象的独特个性，也不故意“拔高”或“贬低”对象的某些方面，而更注重将一个真实的、有个性的、活生生的名师形象呈现给大家。

现在，《剪影》已经编写完成而即将出版，我表示衷心的祝贺！我相信它将成为我们复旦人的教材。我相信我们复旦的青年教师和莘莘学子，在细读这本书后将会发现，复旦人是什么样的？怎样才能成为真正的复旦人？复旦人应该追求怎样的人生价值，建立怎样的人生坐标？我希望复旦的青年朋友们深思之、慎抉之，践行之。让我们沿着前辈的足迹，把复旦发展得更好。

我深知，编委会成员为《剪影》的编辑出版付出了艰苦的努力。在此，我要代表学校对本书的主编、编委、老同志们和作者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复旦将牢记你们的贡献，并将此项事业不断地延续下去。

感谢复旦大学出版社编辑提供的支持！

是为序。

2013年9月22日

序

陈至立

《复旦名师剪影》编辑出版了。我读着《剪影》中的文章,心里涌动着深深的敬佩和思念之情。

1964年我从母校毕业,虽说斗转星移,至今已近五十个年头,但母校的培育、老师的教诲,我终身难忘。复旦的天光云影,复旦泽被莘莘学子的老师,尤其复旦教坛的名师、学界巨擘、文林俊杰的名字深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

感谢我们的前贤创建了复旦。作为复旦学子,我感恩母校,感恩所有的老师,向母校致敬!向老师们致敬!

感谢复旦的名师,是他们的智慧洞开了学子们的心灵之窗;是他们的为师风范和高尚人格,涵育和塑造了学子们的品格;是他们成就了百年复旦的辉煌,为国家和社会培养了大批栋梁之材。

《剪影》生动地记录了名师们的理想和追求,充分展现了他们的成就和风采。继承他们的事业,弘扬他们的精神,是复旦人应尽的光荣责任。

马相伯先生冲破法国教会的束缚创建了复旦大学,陈望道先生在茅屋里完成中国第一个全译本《共产党宣言》的翻译,苏步青先生以他的智慧开创了中国的微分几何学派,谈家桢先生坚守摩尔根遗传学的科学精神并作出巨大贡献,周谷城先生不畏世情而坚持自己的历史哲学观,谭其骧先生呕心沥血完成《中国历史地图》巨著,严北溟先生对传承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作出突出贡献,刘大杰教授在中国文学史研究上取得独特研究成果,蔡祖泉教授在电光源领域里实现跨越式赶超,谢希德先生治学治校的高超艺术和对学子们慈母般的关怀,还有……。正是所有这一切,铸就了复旦的辉煌历史、光荣传统和精神品格。

名师,是学校的名片。人才荟萃,大师云集,能召唤和聚集千万学子,激发他们的追求和梦想。校园的名师文化则是无形的力量,巨大的熔炉,能熔炼人、铸造人,使之成为有用之才。这本书是对复旦校园名师文化的凝聚和

提炼。编写出版这本书,可以使复旦名师的风范薪火相传、代而有续,意义重大。

希望所有复旦人尤其是青年师生都能认真阅读此书,从中汲取精神的动力。向名师学习。学习他们对教育事业的无限忠诚;学习他们以德立身、刚直守正的高贵品格;学习他们勇于探索、追求真理、开拓创新的精神;学习他们脚踏实地、求真务实、严谨治学的科学态度;学习他们艰苦奋斗、谦虚包容、淡泊名利的优良作风。新松沐露高千尺,这是人民对复旦青年师生长成的期望。

相信新老复旦人一定会接过先辈的薪火,继往开来,日月光华,旦复旦兮,为科教兴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断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2013年7月16日 于北京

目 录

以“人”为本,叙说复旦——序《复旦名师剪影》	杨玉良(1)
序	陈至立(1)
一老南天身是史——记爱国老人、复旦大学创始人马相伯	鄂基瑞(1)
私立复旦大学奠基人李登辉	钱益民(9)
雨湿神州望故乡——记民主革命先驱、教育家于右任	许有成(15)
“红透专深”的标杆——记陈望道先生	宗廷虎(21)
中国人类学的奠基人——记吴定良教授	吴融酉 夏元敏(31)
一位杰出的科学家和教育家——纪念陈建功导师	任福尧(36)
恂恂仁者狂狷性 细照隅隙求是风——记郭绍虞先生	蒋 凡(41)
但酬光与热,哪计利和名——记朱东润先生	陈尚君 仇鹿鸣(48)
陈子展先生教我搞研究	汤漳平(56)
春风中的烈焰——记历史学家周予同教授	廖 梅(62)
坚持真理 诲人不倦——周谷城先生学术研究、教书育人故事	李春元(68)
垦荒者的足印——耿淡如先生二三事	张广智(75)
勤奋治学 真诚待人——追思谢六逸先生	姚福申(81)
文章道德照耀儒林——忆王遽常教授	李定生(87)
外文系的第一位博士生导师——回忆伍蠡甫教授	袁晚禾(96)
我国现代语言学大师——忆张世禄先生	乐秀拔(101)
高山仰止 德耀文林——纪念苏步青教授	陆士清(107)
文坛、讲坛、艺坛皆蜚声——难忘赵景深先生	苏兴良(118)
严谨治学问 悉心育学生——忆恩师全增嘏先生	黄颂杰(123)
数学系主任的积分方程——记陈传璋教授	侯宗义 张万国 程 晋(131)
科学业绩 山高水长——纪念著名动物学家张孟闻教授	王钱国忠(136)
一位化学家的人文情怀——纪念顾翼东教授 110 周年诞辰	谢高阳(142)
跟蒋天枢先生读书	邵毅平(149)

- 20 世纪最有才气的中国文学史家——记刘大杰先生 陈尚君(155)
- 一身正气 大义凛然——记梅汝璈教授 王尧基(165)
- 披荆斩棘播经典——怀念漆琪生教授 陶增衍(169)
- “憨劲”的传承——怀念严志弦教授 张华麟(174)
- 求真求是的一代哲人——忆胡曲园教授 金邦秋(179)
- 百岁华诞出奇迹——记从副校长岗位退下后的蔡尚思 傅德华(185)
- 中国海洋学高等教育的开创者——记薛芬教授 薛碚华(191)
- 远去的回声: 聆听“鸣老”之鸣
- 植物病理、病毒学家王鸣歧的故事 陈永青(198)
- 神经解剖学先驱者——记卢于道教授 唐仲良(204)
- 学者痕迹——忆林同济先生 林骧华(209)
- 我的导师徐燕谋先生 陆谷孙(215)
- 传奇教授葛传槩 毛荣贵(217)
- “平民系主任”王福山的物理学生涯 林溪波(224)
- 回忆师从朱伯康先生的日子 施正康(230)
- 柔亦不茹 刚亦不吐——忆严北溟教授 李继宗(235)
- 让马列主义哲学薪火相传
- 陈珪如教授翻译、传授马列哲学著作纪实 金邦秋(241)
- 现代人口学倡导人之一——忆吴斐丹先生 尹伯成(246)
- 坚持上基础课的教授——怀念周同庆先生 郑帆(251)
- 我的恩师杨岂深教授 孙建(256)
- 谈家桢星——记谈家桢教授 朱江燕(260)
- 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怀念我的老师季龙(谭其骧)先生 周振鹤(265)
- 高烧红烛照残篇——忆杨烈先生 张介眉(269)
- “我更像一个旧文人”——缅怀敬爱的吴征铠先生 念秋(272)
- “我乐趣所在——讲台、实验室”——记吴浩青教授 吴平(278)
- 以图载史 以身育人——记舒宗侨教授 韩学玮(284)
- 一树独先天下春——怀念敬爱的王中教授 居欣如(289)
- 父亲卢鹤绂的一生 卢永亮(297)
- 从希望的田野上开始——纪念父亲李振麟 李南田(303)

贾植芳先生的学术人生	张业松	段怀清(309)
博闻强识 慧眼独具——忆鲍正鹄先生		鄂基瑞(315)
语言学家胡裕树		戴耀晶(322)
只有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有出路		
——忆蒋学模教授二三事		王克忠(326)
乐育英才的法语名师——忆林秀清教授		朱 静(331)
经济学家的平凡一生——纪念父亲宋承先		宋慧毅(337)
“我、爱、中、国”——记谢希德教授		王增藩(341)
正直仁厚的长者——同忆朱京先生		
	蔡显鄂 孔德俊 郑成法	项一非(347)
美学大师的如鼎人生——忆蒋孔阳先生		鄂之华(352)
毕生精力献给大学英语教育事业——纪念董亚芬教授		李荫华(358)
一个发光的名字——追忆蔡祖泉教授		陆士清(362)
谷超豪的数学王国		王增藩(372)
留学归来奉献青春——怀念周介湘先生	马礼敦	朱裕贞(381)
光学在复旦——深切怀念章志鸣先生		
	应莹同 王文澄 孙迭麓	陈惠芬(387)
我崇敬的师长——怀念华中一先生		顾树棠(394)
中国现代管理教育的开拓者		
——记郑绍濂教授	骆品亮 傅 烨 华宏鸣	桑贻陶(401)
治学严谨 正气浩然——怀念丁淦林老师		张骏德(409)
用生命拼搏在教坛科苑——记邓景发院士		王新民(415)
教授的风采与魅力——我的导师陆国强先生		王 颖(420)
他在讲台站了半个世纪——怀念我的导师金重远		赵庆寺(423)
培栽桃李 恒心永志——忆章培恒教授		乐秀拔(431)
复旦的“中国芯”——怀念叶仰林教授	张国权 顾树棠	章倩苓(440)
用武之地在我的祖国——记郑祖康教授		袁晓君(447)
后记		王小林(452)



马相伯(1840—1939),江苏丹阳人。复旦大学创始人,首任校长。原名志德,亦名建常,改名良,字相伯。12岁来上海,入法国天主教耶稣会在徐家汇设立的伊纳爵公学(即今徐汇中学),先后学习法文、拉丁文。1862年进入耶稣会创办的初学院,研修中国文学、哲学、神学。1903年应蔡元培之请开办震旦学院。后因教会阻挠,引起学生公愤而集体退学。1905年9月在吴淞复校后,改名为“复旦公学”,任校长。辛亥革命后,经于右任、蔡元培呈

请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批准复校,续任校长。1914年后历任政治会议、约法会议议员,参政院参政、平政院平政等职。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号召停止内战,团结抗日,被尊为“爱国老人”。1939年11月病逝于越南凉山。

一老南天身是史

——记爱国老人、复旦大学创始人马相伯

鄂基瑞

每当复旦人迎着朝阳漫步在校园的林荫道上,夜晚坐在相辉堂前的大草坪上仰望复旦璀璨的星空时;每当复旦学子聆听大师的教诲,吮吸着复旦的日月精华时;每当一批批学生学成,依依不舍地告别复旦奔赴世界各地时,他们总会情不自禁地感恩复旦,感恩自己脚下的这一片热土,而流传了一百多年的马相伯老人毁家兴学的故事会重又浮现在他们眼前。

毁家兴学 复旦光华

出生于1840年的马相伯见证了洋务运动、甲午战争、戊戌变法的失败之后,目睹八国联军瓜分中国的惨痛现实,清醒地看到清王朝已末日将至。面对风雨飘摇的祖国河山,马相伯思考欧美强大和中国孱弱的原因,结合当年游历欧美参观几所大学的观感,他恍然而悟“自强之道,以作育人才为本;求才之道,尤以设立学堂为先。”

于是,他决心在中国兴办新型教育,培养救国救民人才。1900年后,他寄希望于教会,毅然拿出位于松江、青浦的家产良田3000亩,捐献给天主教江南司教,并在捐献家产兴学字据上写道“愿将名下分得遗产,悉数献于江南司教日后所开中西大学堂收管,专为资助英俊子弟资斧所不及。”

天主教会虽然接受了马相伯的财产,但并不办学。真正迈出办学第一步的还是马相伯自己。

其后,马相伯居住于上海徐家汇土山湾,蔡元培执教南洋公学,两地相近,蔡元培常去向马学习拉丁文。蔡又从南洋公学中介绍24名优秀学生到马相伯处学习拉丁文、法文、数学等,筹组译社。1902年11月,南洋公学学生反对当局的封建压迫,200余人高呼“祖国万岁”,集体离校退学。退学学生请求中国教育会负责人蔡元培协助组织“共和学校”。蔡元培除与教育会协助成立爱国学社外,还介绍一些学生到马相伯处求学。马相伯欣然允诺,遂创学院,定名震旦。震乃秦字谐音,系古代外国对中国之称呼,旦即早晨,“震旦”意谓中国之曙光。

1903年2月27日,震旦学院举行开学典礼。马相伯在会上发表演说,反对科举制度,反对我国自秦汉以来的“奴隶”之学、“为人”之学,提倡“格物穷理”之学、“自主”之学。马相伯宣称“有欲通其外国语言文字,以研究近代科学,而为革命救国之准备者,请归我。”当时,马相伯自任监院(即院长),主持教务。他继承中国书院传统,吸取外国研究院优点,采用名儒师徒传授办法,以60余岁高龄,亲自教授拉丁文、数学、哲学,编写《拉丁文通》、《致知浅说》为教材,视学生如家人子弟,共食同游,亲切恳谈,循循诱导。

马相伯虽世奉天主教,借用教会力量办学,却宣布办学三条宗旨:一、崇尚科学;二、注重文艺;三、不讲教理。

马相伯规定对学校内部事务,由学生自行管理,财政公开,藉以养成共和精神。除总干事、会计由马相伯从学生中选定外,其余干事由学生选举,轮流担任,以培养学生自治精神。马相伯着重启发式教学,指导学生钻研科学的方法和途径。他在选择教材时,一反当时使用浅薄外文作课本的习俗,精选西欧名著为教材,如用西塞罗(Cicero)演说为拉丁文课本,选莎士比亚作品为英文课本。马相伯本擅长演说,每逢星期日上午,他必召集学生进行演说,或研究时事,或讨论学术,或纠正学生违反校规的行动。为使学生拥有强健的体魄,马相伯规定学生必须参加军事训练,他聘请法国军官为教练,训练兵式体操,并命学生戎服荷枪,赴法国兵营实弹打靶。

马相伯对革命青年十分爱护。一次,他从报上得知,青年举人于右任因

作诗讽刺西太后,被通缉逃亡沪上,便派人招其入学。考虑到于右任经济困难,特免除学膳等一切费用。马相伯还对于右任说“余以国民一分子之义务,为子作东道主矣。”于右任遂化名“刘学裕”入学。

因马相伯坚持“不能把震旦学院办成宣扬宗教的学校,一切宗教教义的宣传均应退出学校的领域”,这触怒了天主教会当权者。1905年春,法国天主教会主管阴谋夺取震旦学院,强迫马相伯“住院养病”,派其爪牙南从周接管,“尽改旧章”,妄图改变学校性质。此举引起学生极大愤慨,决议全体退学。马相伯遂召集离散学生,并与严复、于右任、熊希龄、袁观澜等筹备复校。学生也积极配合,公推马相伯为会长,并选叶仲裕、于右任、邵力子、王侃叔、沈步渊、张轶欧、叶藻庭等7人为干事,协助复校事宜。

在筹备复校期间,徐家汇天主教耶稣会盗用震旦学院名称洽登广告,招收学生。为正视视听,马相伯与严复、熊希龄、袁希涛商议,决定联合发表声明,澄清事实真相。两份声明于1905年农历5月27日同时见报,现将有关公告转录如下:“前震旦学院全体干事中国教员全体学生公白:震旦解散后,除添建之校舍,移赠教会作为酬谢外,凡公备一应器具,暨书籍标本,早经迁出,毫无轲轳,定七月下旬开学,更名复旦公学。旧时院名,久已消灭。此后倘有就旧基重行建设者,无论袭用旧名与否,与旧时震旦丝毫无关。特此敬告。”马相伯还向社会宣布,复校后的校名更改为“复旦公学”。“复旦”二字,取自《尚书·大传》所载《卿云歌》中的“日月光华,旦复旦兮”,即“复我震旦”之意,又暗含“复兴中华”之义。公告登出后,马相伯打电报给他的旧交两江总督周馥,请他助一臂之力。周馥大力支持,暂借吴淞提督行辕作为临时校舍,又拨给吴淞官地70亩为校址,并拨开办费一万两银子。与此同时,严复、熊希龄、曾少卿、萨镇冰、袁希涛、叶景葵等28位校董联名发表《复旦公学集捐公启》向社会募捐。百年复旦,在长江尽头东海之滨,终于奠定了第一块基石。

复校后,复旦公学声名远播,莘莘学子不计远近、不辞劳苦前来报考,第一批人数骤增至500人。经严格筛选、当面口试,最终录取学生50名。1905年中秋,复旦公学正式在吴淞开学,新老学生共160人。复旦创办之初,各种条件均极简陋,然修葺既竣的吴淞提督行辕作为临时校舍,已初具规模。其时,马相伯已然66岁高龄,除延聘名师授课外,仍自告奋勇,担任法文教授。他终日兀坐高台,口讲指画,滔滔不绝,不以为苦,其诲人不倦、献身教育之精神,无不令学子们感动。在马相伯率领下,全校师生筚路蓝缕,自力更生,终于闯出了一条由中国人独立自主创办新型大学之路。

复旦公学成立后,马相伯摆脱了法国天主教会的干扰,终于独立自主办学。他以教育家的睿智眼光,广罗人才,尽废旧式书院教育和清代朴学的治学理念,努力向近代西方教育看齐,培养一批懂外语、习科学、重实用的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人才。1905年,他和严复一起为复旦公学制定了第一个章程,共十九章一百余条。内有办学纲领及宗旨;分离及学级;学科程度;学期、休假;入学程度;考试、开班及卒业;惩戒、退学、除名;课堂规则;演说规则;游息规则;杂诫等等。在纲领及宗旨第一章中,马相伯宣告“本公学之设,不别官私,不分省界,要旨乃于南北适中之地,设一完全学校,俾吾国有志之士,得以研究泰西高尚诸学术,由浅入深,行远自迩,内之修立国民之资格,外之以裁成有用之人才。”诗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宗旨正鹄,固如是已。”他又指出“况世界竞争日亟,求自存以知彼为先,知彼者必通其语言文字。”可见他对外语的重视已经与国家兴亡联系在一起。关于学校学科的设立和分类,马相伯宣布遵照高等学堂定制,正斋(学科分二类:一、政法科、文科、商科大学之预备;二、理科、工科、农科大学之预备。)三年毕业。这是一百多年前复旦公学的学科设置。她和现今的综合性大学相比已初具雏形。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马相伯的教育思想十分超前。在他的培养熏陶下,复旦公学培育了一批杰出的人才。如:精通多国文字后成为国学大师的陈寅恪,中国地理学与气象学的奠基人竺可桢,五四运动青年领袖罗家伦,以及1917年毕业后成为中国矿业大王的孙越崎;至于于右任、邵力子更是出于马氏门下的得意门生;还有中国伊斯兰教著名领袖人物伍特公等。晚年罗家伦回忆在复旦公学李公祠读书情景时,表述了无比的依恋之情。马相伯先生不愧为中国现代教育的先行者和伟大的教育家。

1905年秋,应两江总督周馥邀请,马相伯前往南京演讲君主民主政制之得失及宪法精神,不久,辞去复旦校长一职,由严复继任监督(校长)。1909年,复旦公学校长几度易人,严复、夏敬观、高凤谦相继辞职后,又公推马相伯复任校长,实际校务由李登辉襄助处理。辛亥革命后,吴淞校舍为光复军司令部占用,学生星散。马相伯积极奔走呼告,力争复校。后经于右任、蔡元培呈请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批准复校,并拨大洋一万元,选定徐家汇李鸿章祠堂作为校舍,复校工作顺利完成。1913年后他辞任校长,由李登辉任校长。1913年2月,新的校董会由王宠惠任董事长,孙中山、陈英士、于右任、曹成父、虞和甫、郭建霄、沈缙云为董事。主要任务为筹集资金、聘任校长。(时马相伯已赴北京任职,改聘李登辉为校长)。1917年,李登辉出任私立复旦大学校长,前往南洋募捐并得到各界相助,终于在江湾置地建校,遂

奠定了复旦大学今日之基石。1917年后，唐绍仪任董事长。王宠惠、于右任等续任顾问董事。参与学校管理工作。

“一老南天传历史，黉门百载播芬芳”，马相伯先生为创立复旦大学所作出的巨大贡献，相信每位从复旦校门走出的学子都会永志不忘。

睁眼看世界的人

马相伯之所以有毁家兴学的义举，绝不是偶然的，从某种程度上看，也是历史的必然。这要从马相伯的生平谈起。

马相伯，原名志德，亦名建常，改名良，字相伯，别署求在我者，晚号华封老人，祖籍江苏丹阳，1840年3月17日（清道光二十年二月十四日）生于江苏丹徒（今镇江市）。父名松岩，以教书、行医为业，开过药铺和米、布店。

马相伯出生时，适逢英国发动罪恶的鸦片战争，从此我国逐渐沦入了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悲惨境地，整个民族被欺凌、受侮辱，“万马齐喑究可哀”。但“于无声处听惊雷”，马相伯的一生，是在反抗外国侵略、谋求祖国富强、唤起民众奋起救国之中度过的，是随着时代激流不断进步的一生。

马相伯的父母信奉天主教。他生下不久，便受洗礼，教名“若瑟”。五岁入学，先读天主教经典，后学儒家书籍。他受了天主教影响，认为天子与平民，“同为造物所造，同是有生有死，在上帝之前，同是平等”，“黄金与泥土并无贵贱之分，而泥土比黄金更有用”。他说“我后来的人生观与宇宙观皆从这时顺着这种倾向发展出来的”。他读书时，对于儒家经典的烦琐考据，并不热心，却背着父母私乘民船到上海。其时，法国天主教耶稣会在徐家汇设有依纳爵公学（1927年改名徐汇公学，即今徐汇中学），经友人介绍，他到该校读书。

马相伯在依纳爵公学读书期间，由于资质聪颖、学习勤奋，对于自然科学与数学尤感兴趣，受到意大利籍校长晁德莅的喜爱。十五岁时，开始学习法文和拉丁文，成绩优良，多次受到奖励。十八岁时，法国领事馆请他去当翻译，他毅然回绝说“我学法语，是为中国用的”。他继续在校学习，二十岁时学希腊文。

1862年，耶稣会在上海设立初学院。那年，马相伯二十三岁，进院当修士，接受“神修”训练。1864年，初学院学习期满，他继续在耶稣会内研究中国文学、数学，后入大学院学习哲学和神学。三十一岁时，得神学博士学位，并加入耶稣会，授职为司铎（即神父）。在接受神学博士学位和神父职位时，有着一颗中国心的马相伯曾经再三考虑，认为科学知识是世界人类所共有，

不应分中外。学习西方的学术,应“尽彼所长、转授国人”,使我国与世界同尽其能,所以“西人学社名位可受”;而个人是属于国家民族的,出处行藏不能稍事通融,故“西国官爵富贵不可受,谄西人而挟图本国之富贵,更为可耻,前有洋奴,今有汉奸,君子不为”。

1871年,马相伯奉耶稣会命,去安徽宁国府、江苏徐州府等地传教。当时,值太平天国失败之后,“闾阎困穷、流亡载道”,他请求父亲出家产数百金,救济贫民,为教会所阻。

1872年,耶稣会调马相伯任依纳爵公学校长,兼管教务。他在教学之余,继续研究数学和天文,同时,对学生讲解中国经史子集,学生中考取秀才的很多。耶稣会怕他把学生变为异教徒(孔教),1875年调他专门研究天文。那时,徐家汇天文台只有一架明末利玛窦用过的旧仪器,无法进行研究,马相伯乃专攻数学,把中西数学融会贯通,著有《度数大会》一百二十卷,但教会不予印行,书稿逐渐散失。1876年,耶稣会对马仍不放心,调他到南京任数理编撰。他感到在耶稣会中不可能对国家有所贡献,毅然脱离,但仍信仰天主教,投身于洋务运动。

马相伯的大哥马建勋原在淮军办理粮台,深受李鸿章的信任。经马建勋介绍,马相伯到山东藩司余紫垣处充当幕僚,掌理文案。1877,余紫垣委任马相伯为山东潍县机械局差事。次年,马奉命调查山东矿务。从这些经历中,马相伯深感清廷的腐朽。

1881年3月,黎庶昌出任驻日公使,马为参赞,旋改任驻神户领事。马相伯与日本维新要人大隈重信、伊藤博文等相往还,对日本维新政策有较深认识。秋,马因兄病回国,拜见李鸿章于南京,李即命其随往天津办事。

1882年,马奉李鸿章命,赴朝鲜襄助办理新政。他到朝鲜以后,“首请彼政府编练新军”,“次则整理他们的外交”,同时向朝鲜国王提出全面改革内政的条陈,其中有省刑罚、定刑典、广取才、恤奴婢、求庶富、慎疾疠、兴工艺、兴学校、正经界等九事,大抵为日本行之有效的资本主义政策,但是朝鲜政府封建积习太深,延缓不办。六月,朝鲜发生政变,清廷派其弟马建忠、丁汝昌、吴长庆等带兵前往协助“平乱”。马相伯在政变平息以后,仍留在朝鲜,曾建议闵妃派太子去欧美留学,以便回国后担当重任,不果行。次年,马相伯回国述职,向李鸿章报告朝鲜政府旧习太深、改革难行,并表示不愿再去,建议“即早决定对韩政策”。马相伯从朝鲜政府的腐朽,看到了中国的问题,深有感慨地说“中国者放大之高丽(即朝鲜),而高丽即具体而微之中国也。”“我感觉到清政府的寿命已不可能长久。”不久,他奉李鸿章之命,协助

收回招商局,提出“改革招商局”建议。其后,他与马建忠、盛宣怀、周馥等人建议向美国商人借款,组织银行、发行纸币、整顿金融、开发矿产、建设铁路,这些极富有改革、创新精神的建议,由于清政府当权者腐败无能,终未被采纳。此时,他终于明白清政府已经病入膏肓,无药可救,于是转向教育救国。

国家之光 人类之瑞

伴随着近代中国社会的风雨飘摇,马相伯一直致力于救国救民之改革事业,从不计自身沉浮与得失。1907年4月,于右任等在上海创办《神州日报》,他为之题辞鼓励。是年下半年,梁启超在日本东京组织政闻社,宣称致力于提高国民素质,推动立宪政治实行,特请马相伯担任该社总务员,马立刻应允,并于11月赴日本东京、横滨出席政闻社社员大会。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马相伯参加江浙诸省联军总司令部工作,被任命为外交部长;并在民国成立后,任江苏都督府外交司长。1912年8月,马相伯赴京任袁世凯总统府高等顾问,一度代理北京大学校长之职。1914年以后,他历任政治会议、约法会议会员,参政院参政,平政院平政等职。其间,马相伯仍致力于学术文化事业,与英敛之上书罗马教皇,建议在中国创办大学,并赞助英敛之在北京香山创办辅仁学社(辅仁大学前身);马相伯赴京任职,是受袁世凯的邀约。他们原本是旧相识。早在1882年,马奉李鸿章之命赴朝鲜协助办理新政时期,袁在马建忠、丁汝昌之下任下级军官。但袁是个贪鄙、寡廉鲜耻的小人,马相伯心中十分明白。袁曾向马请教如何才能高升。马说:在中国只有多送礼多巴结上级。这原是一句玩笑话。袁却用此法步步高升、直至坐上总统宝座,成为窃国大盗。马赴北京后并不配合,袁却给了他许多头衔,希望他和筹安会六君子严复、梁启超、杨度等人一样助他复辟帝制。马相伯予以拒绝。但他对筹建函夏考文苑十分有兴趣,想效仿法兰西科学院建立一所中国人文科学院。于是他和章太炎梁启超先生等联手合作,共同发起创办“函夏考文苑”(“函夏”指全中国,考文苑类似研究院),旨在网罗全国著名学者,编纂词典,校勘古籍,奖励优秀著作,表扬高尚德行,可惜未能办成。

1915年7月,马相伯担任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当时,袁世凯提倡“尊孔读经”,为复辟帝制制造舆论。马相伯以信仰自由为原则,断然加以反对,并著文抨击袁世凯复辟称帝之举,称“百复辟,百自亡”。1919年,马相伯已80高龄,“厌闻时事”,虽挂有许多虚职,但主要居家整理旧稿,从事译作,唯对宗教和教育事业仍很关心。当时,马相伯十分忧心祖国的教育事业,不仅